

文化史



明清文化史札记

冯天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化史



明清文化史札记



冯天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清文化史札记/冯天瑜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名家名著)

ISBN 7-208-06632-9

I. 明... II. 冯... III. 文化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IV. K248.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6598 号

责任编辑 孙 瑜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名 家 名 著 ·

明清文化史札记

冯天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 插页 4 字数 350,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7-208-06632-9/K·1268

定价 35.00 元

.....

作者简介

.....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辛亥武昌首义史》、《张之洞评传》、《“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



名家名著

名家名著

中国创世神话	陶 阳	牟钟秀 著
方言与中国文化	周振鹤	游汝杰 著
中西文化交流史	沈福伟	著
明清文化史札记	冯天瑜	著
佛教与中国文学	孙昌武	著
东周与秦代文明	李学勤	著
中国神话学	潜明兹	著

江村经济	费孝通 著
乡土中国	费孝通 著

善的历程
——儒家价值体系研究 杨国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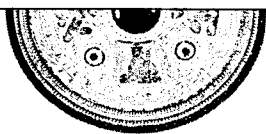
弁 言

中国自秦代(前 221—前 206)正式确立专制君主集权政治、地主—自耕农经济,并逐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外儒内法、儒释道三教共弘的文化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这种文化形态于起伏跌宕间延绵生发,而明代(1368—1644)与清代(1644—1911)则是其登峰造极并发生时代性转换的阶段。笔者长期研习明清文化,有多篇议及此间文化事项和文化人物的习作,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和末期先后结集于《明清文化史散论》和《中国文化史断想》二书,今次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盛意,从上述两种论文集中摘取十七篇(基本保持原文状态),与两个集子之后写就的两篇文章一起编成《明清文化史札记》。对于内容错综繁富的明清文化而言,“札记”仅仅初涉若干片断,所谓挂一而漏万,只能说是提出了一些论题。近二十年来,笔者另有几种讨论明清文化的专书,如《“千岁丸”上海行——1862 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张之洞评传》(与何晓明合撰)、《晚清经世实学》(与黄长义合撰)、《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与谢贵安合撰),可视为这本“札记”提出论题的补充说明,一并供同好者参考,并期待指教。

冯天瑜

2006 年 7 月 6 日

记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弁言(I)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1)

《郁离子》与元明之际的社会矛盾(26)

“三言”、“二拍”表现的明代历史变迁(43)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67)

利玛窦创制汉字新语的贡献(85)

徐光启的学术路线(105)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118)

民主理念内在根源考辨——以《明夷待访录》为例(143)

顾炎武文化思想初探(166)

王夫之创见三题(181)

明代宦官干政及其对明代文化的影响(196)

明清文字狱述略(220)

明清类书丛书编纂评述(235)

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254)

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刍议(270)

具有时代界碑特点的文化巨匠——魏源(295)

洋务派与改良派思想交锋的记录——读《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随笔(317)

“变易”与“不易”的二律背反——洋务派“变法”观述评(329)

清人对“封建”的两种评议(337)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

“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考古通说》

一、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文化”，是汉语古典词，又在近代赋予了新的涵义。

早在先秦，“文”、“文化”等字样已屡见于各种典籍。《尚书序》曰：“由是文籍生焉”，这里的“文”指文字。《尚书·大禹谟》曰：“文命敷于四海”，称颂大禹以文德布陈于四海，这里的“文”，指文德教化。《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处“文”与“德行”对应，指道艺，即诗书礼乐之类，或谓“六艺之文”。《论语·雍也》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为自然形态胜于人为形态的谓之“野”，人为形态胜于自然形态的谓之“史”，人为形态与自然形态彼此切合，就符合君子的风貌了。在这里，“文”与“质”对称，具有“修饰”、“人为加工”等含义。

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的贲卦《彖传》开始把“文”与“化”联系起来使用：“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 《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

● 《易经传义·解注辨正》。

下。”孔颖达在《易正义》中对这段话作了如下解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宋代理学家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则说：“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此处所谓“人文化成天下”可简写作“文化”，含有以“文”来“教化”天下的意思。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较宽泛的文化观。他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清儒彭申甫对文化也有类似的解释：“大而言之，则国家之礼乐制度；小而言之，则一身之车服，一家之宫室。”●

总之，中国古籍（主要是儒家典籍）里的“文化”，指诗书礼乐、政治制度、道德伦序，以及成为礼俗的一整套观念和习俗。古人还往往把“文化”指作王朝所施文治教化的总和，如《说苑·指武》曰：“凡武之为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如南齐王融的《曲水诗序》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些用法与我们今天常说的“文化”在含义上有近似之处，但又颇相差异。

至于近代通用的“文化”一词，是从拉丁文 Culture（拜神，耕作）意译而来。它含有广义与狭义的双重内容。就广义而言，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狭义而言，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此外，考古学上的“文化”，则指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的总体，通常以首次发现地点或特征性的遗迹、遗物而命名，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

从总体上考察人类文化的进步，是文化史的任务。既然“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别，因而“文化史”也就必须作相应的区分。广义文化史，指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总和的历史，实际上与社会发展史相近似；狭义文化史，则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的发展史，也即精神文化及精神文化物化现象的发展史。文化史不是诸观念史（文学史、艺术史、史学史、哲教史等）的拼合，而是着眼于对诸观念侧面的综合考察，通过物化的精神和精神的物化的双向探求，了解族群、民族、国家的文化性格及其生成机制，并探讨其发展走势。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文艺

思想、科技思想以及社会风尚等精神文化的诸多侧面,往往杂糅于学术著作之中,因此,我们可以把思想学术史作为狭义文化史的主干看待,当然还要由此主干旁及思想学术的物化现象的考察。

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多以政治、军事演进为主要内容,正如梁启超所说:“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①但我国古代学术及史学著作也有关于诸子、艺文、典章、方伎、学案等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如《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史记·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刘歆的《七略》,以及二十四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道学传”。至于近古学者编撰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已具有某一断代学术文化史的雏形。欧洲古典史学描述的对象是战争,以及由战争旁及的政治活动,因此,恺撒等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就是史学家。欧洲中世纪史学更有忽视文化史的倾向,犹太史、教会史构成其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与教廷推行神学蒙昧主义直接相关。18世纪的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较早把文化史引入历史学范畴。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展示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文化发展的成就,文学艺术、科学、哲学都有专章论述,这在史书中是开创性的作法。在《论各民族的风尚与精神》(1756年出版)一书中,他针对欧洲中世纪史学的只重政治军事的偏颇,指出历史学的范围不限于政治、军事和宗教,还应当包括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的历史。基于此种认识,伏尔泰提出撰写文化史的任务,并具体考察了文艺复兴运动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突出贡献。以后两百年间,欧洲人文学者编著的文化史大批涌现。我国在“五四”以后翻译介绍欧、美、日文化史著作甚多,有些学者还仿此体例编写了若干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所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近古和近代学术文化史的开创性作品。柳诒徵、陈登原等更分别编著通论性的《中国文化史》,曾列入“大学丛书”,至今读来,仍给人启示良多。此外,日本、英美学者也写出多种中国文化史,各具特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很重视文化史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是广义文化史的杰作;列宁关于把文化看成人类创造的知识总汇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0页。

●
《二心集·习惯与
改革》,《鲁迅全集》

第4卷,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1年版,
第224页。

的思想以及关于“两种文化”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近代文明的解剖刀;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葛兰西、季米特洛夫等也有文化史方面的专论。鲁迅的早期论文不少涉及文化史,中后期杂文更多有文化史方面的精彩论述,如他赞扬列宁“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观点,并号召文化工作者“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①。这都是我们研究文化史的指导性箴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广义文化史被社会发展史所取代,狭义文化史则分解到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史学史、文学史、科技史之中,很少有人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作综合性研究。这样,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文化史的各个分支研究大有进展;但文化史专论却寥若晨星,文化通史、文化史概论、断代文化史,更成为空白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疏忽。笔者为了引起时贤注目于这个被荒芜了的领域,拟以广义文化史作背景,从狭义文化史着眼,探讨观念形态的文化在明清两代发展的若干环节,考察这几百年间中华先民精神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迁,社会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有着怎样的进展,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情形和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和风尚的异动状况,以求窥见这一阶段文化的特色和发展大势。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阐述道:“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些论述昭示了一个道理——文化史是与经济史、政治史交相渗透、互为表里的,研讨文化史不可不兼及经济史、政治史,也就是说,狭义文化史应不断从广义文化史那里获得启示,吸取营养,受到检验,而不能与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研究文化史除了必须注意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之外,还有若干方法论问题值得探讨。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治

学方法时,曾概括了三条: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①这三条均属比较方法,是治文化史所必用的。当然,王国维研究的重点领域是古史,他特别重视“地下实物”(考古资料)与“纸上遗文”(文献资料)的互相释证,这就是王氏所称的“二重证据法”。这种方法对于古文化史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王氏在殷周史的探索中别开蹊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二重证据法”。对于明清文化史的研究而言,则更应注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口碑材料的参酌比较。据笔者的体会,从事明清文化史的研究,应当进行纵横两方面的比较。纵的比较,指的是将明清文化现象同上至先秦、下至近现代的文化现象作比较;横的比较,指的是将中国明清文化现象同周边各国(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以及欧洲的文化现象作比较。通过纵横两种比较,可以窥视明清文化的来龙和去脉,并洞察各国度、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研究文化史的基本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②遵照这一方法论原则,我们在探讨精神文明及精神文化物化现象的历史时:第一,应当把握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与整个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在文化史的研究过程中,既要防止忽视逻辑的倾向,切勿把文化史描绘成没有内在统系的碎金断玉的缀合;又要防止把文化史抽象成缺乏历史实在性的概念进程。

①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2 页。

二、中国文化史大要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文化从孕育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的、曲折多致的历程。明清两代的文化,是上古和中古文

《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60 页。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52 页。

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近代文化的前奏。因此，研究明清文化，不可不对整个中国文化史作一通盘考察。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历史，当然与整个社会的进程密不可分，但二者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第二性对第一性的从属关系。根据文化自身演进的历程，文化史有它独特的脉络和轨迹。

中国文化史应当如何分期，目前尚未展开深入的讨论。我们以为，在作这种分期时，首先要注意中国文化特有的延续性。世界一些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等等，其文化曾昌盛一时，但由于内部或外部原因，后来都中断过，使人产生“人去楼空”的感慨；而中国文化自殷商以来，代代相承，虽然多有曲折，却从未中断。仅以文学为例，诗经、楚辞、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此伏彼起，高峰叠见，确乎蔚为大观！具有无比强大的延续力，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和优点。黑格尔在比较各个文明古国之后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①正因为中国文化是延绵不断的，我们在考查中国任何一个断代的文化时，都应探幽溯远，考其源流。其次，还要注意到各民族的文化不是孤悬于世界文化总体之外的，它是不断摄取并消化周边各族文化，并将自己的影响施加于周边诸民族。如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就囊括了戎、蛮、夷、狄等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个文化系统在两汉时期又吸收了西域文化；两汉、魏晋以降，还输入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明末之后，更有欧洲文化注入。因此，今天的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了多种外来文化的复合体，而决非一个封闭式的系统。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文化史上的一条“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的通则——对外来文化“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②。

基于文化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特点，我们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文化史划分为七个段落。

（一）史前——华夏文明的孕育期。

（二）殷商到西周——与宗法封建制相比配，进入神权居统治地位的官学文化时代，此为华夏文明的发育期。

（三）春秋战国——以民本思潮为旗帜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

化兴起,为华夏文明的昌盛期。因诸子争鸣,此间可称之“子学时代”。

(四) 西汉到明中叶——以儒学为正宗的专制帝国文化阶段(其内又分儒学独尊的两汉、道家复兴的魏晋、佛学极盛的隋唐、儒佛相混的宋明等四个段落)。因经学被推尊为正宗文化,此间可称之“经学时代”。

(五) 明末到清中叶——早期启蒙文化(吸收了欧洲古典科技知识)与回光返照的专制帝国文化相交织的文化阶段。

(六)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爱国主义与西方殖民主义、新学与旧学相抗争的旧民主主义文化阶段。

(七) 五四运动以后——与专制时代向共和时代转换相适应,进入以民主与科学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阶段。

前三段可并称为“中国本土文化起源与发展期”,第四段可称“中国与印度文化接触、融变期”,第五、六、七段可并称为“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接触、融汇期”。

下面对这七个文化阶段分别作简略介绍。

(一) 史前文化,即发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文化

就中国而言,史前文化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初期铜器时代的文化。旧石器时代起自 170 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中经五六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十万年前的丁村人,四五万年前的河套人和 18 000 年前的山顶洞人等文化阶段。新石器时代包括公元前 4 000 年的仰韶文化(彩陶文化),公元前 3 000 多年的龙山文化(黑陶文化)。初期铜器时代则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史前期的生产工具是石器(粗石器和细石器),以后又出现铜器(红铜和早期青铜);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是采集、渔猎及后起的浅耕农业和粗放畜牧业;社会组织经历了群聚、血缘家族、氏族诸形态。史前期精神文明的主要产品是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

① 矛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5 页。

等。”^①由于史前时代没有可供记事用的文字，初民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便担负着保存关于远古回忆的职责；如果没有神话传说，上古历史将更加难以辨认。神话同出土器物一起，共同构成研究史前社会状貌的必不可少、互相参证的两大材料源泉。至于原始宗教，则与神话传说相交织，它是初民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曲折认识，但透过原始宗教这面凹凸镜，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史前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像。

（二）殷商到西周——神权居统治地位的官学文化阶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 页。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河南安阳西北的黄土层中发掘出许多龟甲、兽骨破片，其上多刻有原始文字。1898—1899 年，经清末学者王懿荣、王国维、罗振玉考证，断定这些甲骨文是三四千年前殷王室占卜的记录。这便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文明时代来临的基本标志之一。”^②殷墟发现青铜器、宫殿基址和甲骨文，表明殷商已步入文明社会。当然，就殷墟甲骨文所达到的相当高的水准猜测，中国文字的出现还可上推很久，如商代迁殷之前，甚至夏代，都可能已在使用文字，不过这些假想尚未得到考古发掘的充分证实。目前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是，从夏代开始，我国已跨入文明门槛；殷商至西周，确立宗法封建制。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王和贵族组成统治集团，构成宗法性、等级性的“家”（卿大夫）、“国”（诸侯）、“天下”（王）。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其重要特征是神权至上，迷信支配了人生。殷人尊天事鬼，崇拜祖先神，并以此为族类的尊卑区分，并为宗法等级制度张目。郭沫若指出：“大抵至上神的观念殷时已有之。年岁的丰啬，风雨的若否，战争的成败，均为所主宰。”^③周人代殷以后，发展了“天命”观念和“德治”主义，以“敬天”、“孝祖”、“敬德”、“保民”等一套思想体系为宗法制作论证。殷周文化的另一特征，是学术只限于贵族圈子（包括为贵族服务的文化人——巫、史、祝、卜）之内，即所谓“学在官府”，文化是平民所不能问津、无法企及的，这就称作“礼之专及”。所以殷商到西周的文化可以称作“巫史文化”。殷周两代的自然科学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

③ 《卜辞通纂考释·天象》。

是农学、天文历算学、青铜铸造,都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西周晚期,在自然知识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富于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色彩的阴阳五行说。这种学说对此后三千年中国人的自然观和社会观都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说史前阶段是华夏文明的孕育期,那么从殷商到西周便是华夏文明的生长发育期。

(三) 春秋战国——以民本思潮为旗帜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兴起阶段,可称之文化多元的“子学时代”

西周末年,殷商以来传统的神权至上的官学文化已开始动摇,到了春秋战国,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土地私有制日益发展,“私肥于公”的局面在列国陆续出现,随之而来的,便是旧贵族没落、私田拥有者兴起,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风俗都发生明显变化,诚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战国乃“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种局势反映在文化领域里,便是“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勃兴。

自春秋至战国,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那些“学在官府”的文化人流散到民间。《论语·微子》载,春秋年间,原来在周王室司礼乐的文化官员纷纷移居民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与此同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其他平民阶层中也生长出一批文化人。这两个侧面共同构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新形势。那些来自不同阶级、阶层,承袭着不同源流的文化人,纷纷兴办私学,并由师生授受关系结成学派。《庄子·天下》篇将当时流行的学派概括为孔、老、墨三大派;《史记·六家要指》则把春秋战国的学术派别归纳为儒、墨、法、名、道、阴阳等“六家”;《汉书·艺文志》更将其分为“九流”——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农、杂,这还没有包括兵家和小说家。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可以称作“诸子文化”。

早期儒家是殷周贵族文化的继承者,他们讲礼乐、崇名分,“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博而寡要,劳而少功”^①,不见用

① 《史记·六家要指》。